

刘文典事

一九四三年七月，父亲作长函复寅恪伯父去年八月二十七日桂林来函，附寄丁则良追悼张荫麟文、父亲油印诗页，并赠桂林《旅行杂志》第十六卷第三期一册，该期杂志载有父亲撰写的《(石头记)评赞》。《(石头记)评赞》是父亲根据多年研究西洋文学、哲学、艺术之所得，及自己的体会，对《石头记》作出全面的评论。一九三九年元旦用英文作成，一九四二年秋译为中文(文言)，刊于《旅行杂志》。

父亲致寅恪伯父长函及所附各件，都是托付西南联大历史系本年毕业生房鸿机带去桂林面呈的。父亲在信中谈到西南联大下学期拟聘刘文典教授的事。解聘教师，不是一件小事，更何况解聘一位随校南迁的著名教授。

刘文典教授被清华解聘，父亲最初是听浦江清说的。父亲日记中，只记有为此事不平，没有说明事情原委及内在原因。有一种说法，“是由于一次课间休息，教师休息室中刘先生直指一位读错了古音的同事，这在学界自然会引起极大的反应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是一种令人难堪的羞辱。由羞辱而积怨，终于导致报复，贤者在所不免。”另一种说法，谓一九四三年春，普洱磨黑井大盐商张希孟请刘文典为其母写墓志铭，并作游记，开发该地；刘一九四三年四月赴磨黑。五月，学校按惯例给教师发送聘书。时任清华中文系代理主任的闻一多本不满刘文典去普洱，学校未与他联系径直发送聘书，大怒，立刻给刘去信称，发了聘书，也要收回。且云：“昆明物价飞涨数十倍，切不可再回学校，试为磨黑盐井人可也。”据说文一多发信前找过文学院长冯友兰，提出对刘文典先停薪然后考虑解聘。冯“看到闻一多态度很是坚定，便接受了这种处理意见”。

事实经过究竟如何？刘文典本人也有说明。他起初认为闻一多的信不过是“半官式信”，没有回复；只给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写了一信说，“雨季一过，必然赶回授课，且下半年愿多教两小时，以为报塞。”七月二十五日，刘文典又给联大常委、清华校长梅贻琦写去一封信说明情况，自剖心迹。此信寄由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转，全文如下：雨涵先生校长道鉴：敬启者，典往岁浮海南奔，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；辛苦危险，皆非所计，

旷世知交的友谊与人生——

吴宓与陈寅恪(2)

◆ 吴学昭

六七年来亦可谓备尝艰苦矣。自前年寓所被炸，避居乡村，每次入城，徒行数里，苦况尤非诸墨之所能详。两兄既先后病歿湘西，先母又弃养于故里。典近年日在贫困交迫之中，无力以营丧葬。适滇南盐商有慕典文名者，愿以巨资请典为撰先人墓志。又因普洱区素号瘴乡，无人肯往任事。请典躬行考察，作一游记，说明所谓瘴气者，绝非水土空气中有何毒质，不过疟蚊为祟，现代医学，尽可预防。“瘴乡”之名倘能打破，则专门学者敢来，地方富源可以开发矣。典平日持论，亦谓唐宋文人对瘴气夸张过甚，王阳明大贤，其写旅文一篇对贵阳修文瘴气形容太过。实开发西南之大阻力，深愿辞而辟之，故亦遂允其请。初拟在暑假中南游，继因雨季道途难行，加之深山中伏莽甚多，必结伴请兵护送。故遂以四月一日首途。动身之先，适在宋将军席上遇校长与蒋梦麟先生、罗莘田先生，当即面请赐假。承属以功课上事与罗先生商量，并承借薪一月治装。典以诸事既秉命而行，绝不虞有他故。到磨黑后，尚在预备玄奘法师传，妄想回校开班，与东西洋学者一较高下，为祖国学术界争光吐气。不料五月遽受停薪之处分，以后得昆明友朋信，知校中对典竟有更进一步之事。典初尚不信，因自问并无大过，徒因道路险远，登涉艰难，未能早日返校耳。不意近得某君来“半官式”信，云学校已经解聘。又云，纵有聘书亦必须退还。又云昆明物价涨十数倍，真有此事耶？米果贵至一元耶？切不可再回学校，长为磨黑盐井人可也。其他离奇之语，令人百思不解。典此行纵罪在不可赦，学校尽可正式解聘。既发聘书，何以又讽令退还？典常有信至校中同人，均言雨季一过，必然赶回授课，且有下半年愿多教两小时，以为报塞之言。良以财力稍舒，可以专心全力授课也。此意似尚未向罗先生提及也。此半官式信又言，典前致沈刚如先生信中

措辞失当，学校执此为典罪状。伏思典与沈君笃交，私人函札中纵有文词失检之处，又何致据此兴文字之狱乎？学校纵然解聘，似当先期正式通知，何以用此半官式信？此事芝生、莘田二公亦无片纸致典，仅仅传闻昆明谣言典一去不返，故正觅替人。典虽不学无术，平日自视甚高。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，无论如何吃苦，如何贴钱，均视为应尽之责。以此艰难困苦时，绝不退缩，绝不逃避，绝不灰心；除非学校不要典尽责，则另是一事耳。今卖文所得，幸有微资，足敷数年之用。正拟以全副精神教课，并拟久住城中，以便随时指导学生。不知他人又将何说？典自身则仍是为学术尽力，不畏牺牲之旧宗旨也。自五月以来，典所闻传言甚多，均未深信。今接此怪信，始敢径以奉询，究竟典致沈君私人函札中有何罪过，何竟据以免教授之职？既发聘书，何以又令退还？纵本校辞退，典何以必长住磨黑？种种均不可解。典现在正整理著作，预备在桂林付印。每日忙极。今得此书，特抽暇写此信，托莘田先生转呈。

先生有何训示，亦可告知莘田先生也。雨季一过，典即返昆明，良晤匪遥，不复多赘。总之，典个人去留，绝对不成问题，然典之心迹不可不自剖白。再者，得地质系助教马君杏垣函，知地质系诸先生有意来此研究。此间地主托典致意，愿意全力相助，道中警卫，沿途各处食宿，到普洱后工作，均可效力，并愿捐资补助费用。特以奉闻。忙极，不另写信矣。专此寸简。敬请 道安不一 弟刘文典再拜（一九四三年）七月二十五日

梅校长收阅刘文典长函一个多月以后，始于九月十一日手拟信稿，简复如下：叔雅先生大鉴，日前得罗莘田先生转来尊函，敬悉种切。关于下年聘约一节，盖自琦三月下旬赴渝，六月中方得返昆，始知尊驾亦已于春间离校，则上学期联大课业不无困难，且闻磨黑往

坚不可摧

——日军战俘营的盟军战俘

秦忻怡



经过多年的努力与挖掘，越来越多的“二战”史实浮出水面，特别是中国沈阳和辽源都曾关押过二战盟军战俘的史实，也被披露在世人面前，使日本法西斯的罪行又重重地加上了一笔。尽管这段历史被尘封了70年，但受尽折磨和屈辱的往事对许多美国战俘老兵来说，仍然是抹不去的梦魇。作者历时4年，采访了李奇、奥利弗·艾伦、罗伊·韦弗、罗伯特·布朗等曾经对战俘的美国老兵，把他们在“二战”时期日军集中营中所经历的种种事情还原出来，并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淋漓尽致控诉。

1.我们要见证这段历史

时间倒退到2007年5月。

21日7:30,我和九一八战争研究会的孙玉莲一起到达酒店，一进厅堂，我便惊喜地看见了奥利弗·艾伦。奥利弗·艾伦是362号战俘老兵，今年86岁，高高的个子，胖胖的肚子，加重了身体的负担，走起路来很不利落。艾伦脸上有块大的皮肤怪怪，斑点这儿一块那儿一块，有点像“白癜风”，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战俘生活留下的后遗症。

我跑上前去，掏出纸笔，可是约请的翻译还没到。我只有请求大堂的援助，但她对艾伦的讲述不太明了。

可怜的奥利弗·艾伦面对着我们三个“木头人”讲了一通，见我只是木讷地应着，可能觉得有些对牛弹琴，便起身离开了。

慢慢的人越来越多，偌大的厅堂变得拥挤起来。老兵们有的是和夫人一起来的，有的带着儿子或者女儿，有的是战俘的后代自己来的。他们有的互相攀谈，有的正聆听美妙的钢琴曲。

87岁的海尔·利思，参与了当年解救战俘的行动。这是战后他第二次来中国。利思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：李和德，但熟悉他的中美友人都亲切地叫他李奇。

李奇拿出自己撰写的《营救盟军战俘》一书，图书封面上是解救后的温赖特上将。他说，他要把这本书献给纪念馆。

战俘编号190号，已84岁的罗

伯特·布朗拿着他保存完好的珍贵资料和别人交流着。他是位健谈的老人，提到当年所发生的事情，他激动地说：“我18岁时被俘关到这里。我们那时身体都很糟糕，因为根本吃不饱饭，个个瘦骨嶙峋，根本没有力气，但还要干很重的活儿，经常挨日本兵的打骂，有的战友被活活折磨死了。近3年时间总共有几百名战友牺牲。我一米九零的身高，被俘前体重200多磅，出去时体重不到100磅。”

布朗手中的相册，有他本人与其他战俘的合影，也有他跟日本人的合影。其中有一张照片是他和3名医生的合影，3名医生中有一名是日本人。布朗指着这个人，告诉我们：“这个日本医生人不坏，对战俘比较好，战后我去日本看望过他。”

战俘编号578号，85岁的约翰·利帕德，战俘编号552号，84岁的拉菲尔·格里非思，他们胸前的勋章吸引着人们的视线。他们在用另一种方式向人们讲述着自己对国家的贡献。

9点，三辆中巴车从酒店出发，开往沈阳“二战”盟军战俘集中营遗址纪念馆。

纪念馆的门大开着，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一个个表情肃穆，走得相当慢。突然传来细小的啜泣声，我回转身，那个刚才在车上说有笑，已65岁的休·津布尔，看到一张张图片时不能自己地哭了。面对生命不可侵犯的尊严，除了眼泪，还有什么呢？

此次陪同丈夫一起来，美国老兵约翰·利帕德的妻子，73岁的乔·利帕德，一触摸到墙壁，泪水就夺眶而出。“约翰告诉我坚强，不要流泪，但我一想到他在这里度过的苦难岁月，我再也忍不住了……”

73岁的萨莉·洛佩斯·波洛拉女士一直手捧着两张照片，那是丈夫威廉（战俘编号300号）和丈夫的弟弟（战俘编号1051号）。两位年轻英俊的美国军人魂断异乡。萨莉一边看展览一边流泪说道：“他们永远地留在了这里，才20多岁，那么年轻。想起他们我们就很难过。到这里来是很痛苦的一件事，可是我们还是决定来了，我们要见证这段历史。”

萨莉女士这次是带着女儿罗斯玛丽·查维

35.生前知已许寒梅

一位年逾八十的耄耋老人，在其暮年依然能让生命勃发出旺盛的创造力，这在中国艺术史上是具有文化建树意义的。民国十五年丙寅(1926)，缶翁83岁，元旦之日，他按往年旧习，作《丙寅元旦》诗：“我生休问左徒天，八十三翁抱研田……”一种人生的自信与襟怀的豪放，洋溢在字里行间。

二月兰绽放的初春时节，海上名园六三园主、白石六三郎深知缶翁喜画梅咏梅，专门从龙华移来一株老梅树，特请缶翁在王一亭的陪同下来六三园，由缶翁选地种植，以示对这位中国艺坛巨擘的尊重。

5月15日起，海上书画联合会在安乐宫举办书画展览会募捐，缶翁又担纲领军，捐出自己的书画作品，王一亭、曾熙、徐悲鸿、钱化佛、陆廉夫、吕十等人亦捐赠书画，特别是吴昌硕的作品，颇受关注，当场购券者相当踊跃。是年12月22日，中华艺术大学兴学展览会在老靶子路(武进路)福生路(罗浮路)俭德储蓄会开幕，捐赠书画作品达数千件，缶翁一如既往地奉献丹青翰墨。

民国十六年丁卯(1927)，吴昌硕八十四。此年缶翁没有作元旦诗，而是应好友周庆云之约饮春宵楼，老人以调侃的笔调写了《梦庭约饮春宵楼戏成》。三月，缶翁居住的闸北发生了兵乱，吴昌硕与家人避于西摩路(今陕西北路)李伯勤府。吴昌硕的三子吴东迈当时在余杭塘栖任局长之职，当他悉知上海闸北兵乱老父及家人避难于李伯勤处后，即将老父及家人接来余杭塘栖镇小住。塘栖距梅乡超山仅七里水路，适时超山宋梅又吐艳了。缶翁闻讯后，即率儿孙辈们乘舟前往，报恩寺主持持正法师热情地恭迎缶翁的到来，并在那棵千年宋梅下设下了简朴的佛家素宴，在阵阵清幽的梅香中，缶翁与法师谈禅论道，说诗评画，意兴酣畅。

超山的这株宋梅，经受了千年阳光雨露的滋养与冬雪春雨的滋润，枝干虬劲，花开六瓣，香压群芳，可称梅王。缶翁尤其爱观其花色，俏而不媚，艳而不俗，一派典雅之气，从而与梅坞的各种梅花交相辉映，形成了“梅乡十

里香雪海，清芬弥漫溢青山”的奇观。自诩“梅知己”的缶翁此时伫立在梅影下，观望着林木苍翠、景色明丽、古寺幽逸的超山，闻香遐思、心潮起伏。冥冥之中，他觉得自己前生也许就是超山之上的一枝梅。于是，老人指着报恩寺侧、宋梅亭畔的一块向阳坡地，郑重地嘱咐其儿子东迈：“如此佳地，百年后得埋其间，亦为快事。”老人的心愿是归隐梅林，融入青山，冷香永伴。

西湖之夏，风荷拂波，孤山叠翠，苏堤笼烟。缶翁在王个簃的陪同下来到了杭州西泠印社，入住于观乐楼。这也是“天下第一名社”的第一任社长最后一次来到他所心仪的印学圣地，与印社同仁们探讨金石、品鉴印作。就在缶翁小住西泠的日子里，老人的次子臧堪不幸在上海病逝，家人考虑到缶翁经受不住这个打击而秘不相告。缶翁返沪后，家人以臧堪赴日本为由而瞒之。

11月25日，缶翁的孙女棣英出阁，缶庐上下处于热闹的喜庆之中，缶翁也很是兴奋，楼上楼下地走动。当晚，缶翁睡起小便，溺器掉地，侍者人里问讯，缶翁说没什么，只是左边有些麻痺。翌日晨起，缶翁进燕窝汤一碗。不久，就觉得有物塞喉，起喘而不能言，实为中风症状。家人先是请中医来诊治，服药调理，不见好转。又请西医，吃药打针，仍不见效。昏迷三天后，一代书画大师、海派艺术领袖吴昌硕于11月29日(十一月初六)归道山。《申报》1927年11月30日以《吴昌硕逝世》作了报道。

12月1日，吴昌硕大殓，前往吊唁的国内外各界人士不下数千。可见缶翁在中国艺术界的至高地位。缶翁正是从其人格、艺品使人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树起了一座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纪念碑。

1929年秋季，缶翁的灵柩从上海移至超山寄厝待葬。1932年的冬至，缶翁的灵柩入葬在大明堂畔，宋梅亭旁的墓穴。墓坊石柱联是缶翁的同乡、前翰林、陕西学政沈为所题：“其人为金石名家，沉酣到三代鼎彝，两京碑碣；此地傍玉潜故宅，环抱有几重山色，十里梅花。”

《吴昌硕评传》已由文汇出版社出版，**引起连载《金蝴蝶梦》。**

吴昌硕评传



王琪森